



中國人民大學 學報

工作论文系列

Working Paper Series

历史社会学：如何兼得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优势？

任剑涛

JRUCWP2024015

2024. 02. 28

- * 本刊编辑部将那些已通过审稿程序而处于“拟录用”状态的稿件制作成线上展示的工作论文，旨在及时传播学术研究成果而促进学术进步。编辑部还将继续与作者共同努力，修改完善论文，并在其达到刊发标准之后择期正式刊发。当然，若工作论文被发现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则仍有可能被退稿。

历史社会学： 如何兼得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优势？

任剑涛

[摘要] 历史社会学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综合性学科。要达到这样的学科建构目的，需要对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属性、知识趣味与实践指向进行辨析。在学科属性上，它既然不是历史学或社会学的子学科，便是两个素有自身学科传统的综合性学科；在知识兴趣上，它需要整合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知识优势，并促使人们关注它的知识聚焦点，也就是工业社会与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在实践指向上，它需要明确其促进现代健全发展的目标。与此类似，历史人类学等学科也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尝试，才足以自证学科存在的理由。这些跨学科的研究尝试，都必须避免学科的琐碎化倾向，注重科际间的学术资源整合。仅就历史社会学而言，需要高度重视社会理论的规范传统，建构起学科规范理论，从而将它兼得历史学与社会学学科优势的理论企图实际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关键词] 历史社会学；学科属性；知识兴趣；实践指向；兼得优势

在汉语学术界，历史社会学内蕴一点学科发动机的意味。它不但催生了学科自身的疾速发展，催促了不少专著与论文的知识产出，而且引发了相类学科的创制，历史政治学就是一个显例。但历史社会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又以怎样的学术产出来拓展自己的学术地盘，对相类学科的建设作出示范，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近期，关于历史社会学的学科特性、学术定位的讨论，几成学术热点。相关讨论激发人们思考历史社会学的建构必要性及其理由，循此思路，也为相类学科的建构明确方法意识、积累学术资源。

一、寻求学科间优势

历史学也好、社会学也罢，都是具有较长历史记录和深厚学术积累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但各自在自限的学科范围内，都仅仅表现出自己的学科传统与学术优势。这既帮助它们清晰地划分出学科边界，也形成了容易辨认的独立学科优势。历史社会学则与之不同。历史社会学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综合性学科。这门学科，起自 19 世纪中叶、20 世纪初期，学科典范的确立由马克斯·韦伯完成。拉长视距看，历史社会学先后出现两次学科浪潮，“第一次浪潮，从孟德斯鸠和休谟，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到涂尔干和韦伯，持续了很长时间，最终在 20 世纪 20 年代晚期撞在右翼和左翼极权主义的墙上而一蹶不振”^①。中经将近 40 年的沉寂，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到 70 年代末，历史社会学在 T. H. 马歇尔、莱茵哈德·本迪克斯、艾森斯塔德等人手里复活，并在 80 年代迎来“历史社会

作者：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rjthxx@sina.com。

① 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2—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学的黄金时代”^①。如今，可以说历史社会学的发展出现了第三次浪潮，在不长的时段里，已经出现了颇具活力的三代学人，出版了大量引人瞩目的历史社会学著作。

从学科的性质上讲，它确实是想校正理解社会变迁、尤其是理解现代社会发展进程出现的要么偏于历史叙事、要么流于社会结构分析的知识偏失。“历史社会学是对过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寻社会是如何运作与变迁的。一些社会学家缺乏‘历史意识’：在经验方面，他们忽视过去；在观念方面，他们既不考虑社会生活的时间维度，也不考虑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与之相似的是，一些历史学家缺乏‘社会学意识’：在经验方面，他们忽视不同社会的进程与结构的不同；在观念方面，他们既不考虑这些进程与结构的普遍特性，也不考虑它们与行动和事件的关系。相反，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致力于历史社会学的发展，探寻过去与现在、事件与运行、行动和结构的相互渗透交融。他们力图把澄清概念、比较归纳及探索经验紧密地结合起来。”^②可见，历史社会学确实是一门尝试兼得历史学与社会学优势、又力避两门学科一般弱点的新兴学科。

那么，历史社会学能否兼得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优势呢？回答这一问题，一些前置条件需要优先加以讨论。

第一，历史社会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归属很难骤然断定，因为它是试图兼得历史学和社会学学科优势的、含混的知识努力倾向的产物。含混，指的是大家都在历史社会学的名义之下展开研究，却包含了不同的价值倾向与知识努力目标。依照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主张，各自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方法论上的、相似性的发挥，也是自认采取历史社会学研究进路的不同学者的权利。但由此却让人们知晓，历史社会学并不具有严格的知识共同体认受性，其知识努力与学术情感殊为不同。这虽然不构成在历史社会学名义下的理论研究的障碍，却构成历史社会学研究者以及学科间高度一致的学科认同的阻力。一个学科名义下聚集的学者，在面对现代社会及其发展时，依照某种相对一致的立场或进路追溯历史根源，建构研究者比较认同的规范理论问题，并为之进行阐释的知识状态，乃是构成一个知识共同体的条件。显然，目前历史社会学还很难提供给人们认其为一个统一的知识共同体的理由。中国学术界是如此，创制历史社会学的西方学术界的状况同样如此。以至于谁是这一学科的代表性学者，即“谁是名家”的问题成为需要厘清的问题，而哪些学科被动员起来投入历史社会学的研究之中也漫无边际。广义的历史社会学，“包括所有倾向于在具体历史背景下关注社会变迁的社会科学家。在学科分化之后，主要参与的学科不仅是社会学、历史学，还有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考古学、人口学、地理学、民俗学等等。如今，甚至人文、艺术、自然科学都加入其中”^③。这让历史社会学看起来像是一个学术大杂烩。试图将几乎所有学科都一锅煮的历史社会学，肯定需要花费巨大的功夫，才能将之理顺成一门自有规范和赢得认同的独立学科。

第二，历史社会学究竟是尝试进行理论创新、还是服务于实践需要的学科？可以说，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明显受两种基本兴趣——知识兴趣与实践兴趣的交叠驱动。知识兴趣，即研究者追求纯粹知识的精神动力，其推动研究者对整个社会历史从古至今的发展路向，做出宏观整体的理论规划。宏观的规划，可以来自偶发性的历史事件，也可以来自相互关联的历史过程，以及人们对历史运作目的性的认知，源头不一。但不是基于统一的价值理念，而仅仅是基于相对一致的知识兴趣，其不同学者的研究，才会被认作是某种统一命名的研究学科。虽然，在不同分析背后，存在或强或弱的预设价值，但它不构成研究者必须明确表态的进入学科领域的先决条件。从实践的向度来看，历史社会学自然需要继承社会学对现代总体社会进行研究的长过程中已经取得的知识成就，但也要

^{①②} 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③ 郭台辉：《历史社会学的技艺：名家访谈录》，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受制于社会学与历史学两者的学科特殊性及学科基本品质的双重要求。就社会学而言,历史社会学当然不能忘记本学科面对现代社会的取向,即便是在历史向度揭示现代社会成长,以期显示历史社会学兼得历史学与社会学学科优势的知识特长。故知识优势的兼得性,成为它的显著学科特征。不过,一些紧邻学科边界,需要审慎以待:比如,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传统边界的区分问题,就是一个不能轻率对待的问题。研究现代社会的社会学,与研究原始人群的人类学,两个学科的研究存在价值倾向差异。尽管以评价性标准看,人类性研究的原始人群,并不见得就是对他们的蔑视,而社会学致力探究的现代社会,也不等于就是对他们的赞赏。但是,两者的社会结构指向所具有的重大差异不应当被轻忽,否则就丧失了两个学科的独特性或学科边界。在现代中国引进社会学理论之时,聪明的前辈学者对之做出过非常高超的处理,将两个学科合并称之为“社会人类学”,这既有兼得两个学科优势的可能性,但也要冒失去两个学科分别优势的风险。

历史社会学的知识兴趣,并不妨碍它呈现其明确而自觉的实践兴趣。历史社会学的实践兴趣,表现为它所明确解释的核心问题的实践指向。这就是赵鼎新教授所强调的,历史社会学就是要解释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理论探究的,就可以被认作是历史社会学研究;拒绝探究这个问题的,则没有理由纳入历史社会学的研究阵营。这是一个可以争论的断言,但至少提示人们,历史社会学的理论探究,既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空发关乎社会问题的浩叹。它尝试解释现代社会与国家的兴起、发展、兴盛等问题。这是明确针对人类现代实践方案展开的研究。其知识兴趣在兼得历史学与社会学学科优势的雄心壮志上有明确体现,同时在推动人们普遍认同现代社会与国家发展的实践针对上,也具有不可小视的凌云壮志。

寻求诸多学科、甚至全部学科的学术优势集于一身,将早已离散的学术事业聚拢起来,以审查社会何以在历史变迁成为某一趋同样式,可能是历史社会学这一新学科的企图。凡是具有学科雄心的拓新研究者,可能莫不以此为鹄的。无疑,在学科高度、细密分化的今日,那种可以成功兼得多种学科优势、甚至是兼得所有学科的优势,去解析一个学科母题,是给人以极大的期待的,因此那会为人们展现别样的知识风景。只不过寻求学科兼得优势的两种前景会不时提醒雄心勃勃的学科拓新者,如果实现了兼得学科优势的目标,那么就会成为新的学科范式的创制者,这对任何一个尝试学科创新者都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如果实现不了学科的兼得优势,就可能沦为不同学科的笑柄,被人嘲笑为“人心不足蛇吞象”的可悲人物。历史社会学需要审慎对待这样的学科拓展前景。

二、明确知识扎根之地

历史社会学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历史政治学等等,其知识关怀与实践兴趣是联袂出场的。相对而言,如果一定要对两者的轻重进行一个差异化衡量,那么可以说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的实践性驱动力更强。这与两个学科得以兴起的两种动力相关:第一种动力,可以称为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动力;第二种动力,则可以说是勾画历史的社会运行机制,指明人类的现代努力目标。就后者讲,在赵鼎新确认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主题上就可以辨认;就前者讲,这一动力的知识属性比较明显,但不能被归为知识动力。原因很简单,尝试兼得历史学与社会学、或历史学与政治学两个学科的优势的知识建构尝试,不是因为研究者知识兴趣引发的新的知识建构努力,而是因为实践推动他们进行知识建构的转向:从总体上讲,是因为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研究,在丧失或遮蔽了它们对现代目的性规范的把握能力或掌控必要的情况下,取决于知识界外部的权力动力与学术界内部的实践指向,相关研究者的研究无法明确强化人们的现代政治性的共同意愿,于是尝试打破学科畛域,把原先局限于社会学或政治学单一学科的眼光,明确转向历史,以求达到解除学科认同乏力的危机,激发学术活力的目的。

稍微具体地分析一下,则可以说是相关研究者试图达到三重目的,展现了这类学科得以成

型的驱动机制。仅以赵鼎新近期关于中国国家结构的研究为例，可以看出历史社会学的这类当下走向。

第一，是将“历史”当成寻找现代社会与国家的历史位置的趋新路径。赵鼎新通过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结构，建立起一个关于《儒法国家》的宏大叙事。其基本的知识状态，就是把整个中国历史作为替换性的社会宏大理论的叙事对象，免除中国人在现代社会成长中的缺席与尴尬，证明中国历史对现代社会兴起可能作出的贡献，以及中国未曾缺席人类历史中的国家建构进程。诚如他自陈的，他研究的具体问题虽然是古代的，但指向的背后问题仍然是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建构问题，因此是标准的历史社会学问题。尽管在具体的阐释上，赵鼎新的知识建构努力尚存疑点，如以儒法国家定位中国古代国家，显然不完整。因为从历史上讲，诸子百家都是“务为治者也”的思想，对帝制国家的兴起都发挥出不同的影响力，很难单凭儒法两家就清楚地揭示中国古代国家形态。如果不解释中国人的心灵建构，就很难揭示中国人的政治（国家）建构。前者需以儒道互补的揭示来呈现，后者才能以儒法互补的揭示来展示。但其著作属于历史社会学作品则是没有疑议的。就此而言，历史社会学的历史寻根性质展露出来，而历史社会学的社会解释意愿也同时显露。但做到两端均显成功的解释显非易事。原因很简单，从传统社会直接引申不出现代社会，这既是历史的定案，便不是理论解释所能贯通的问题。反之亦然，从现代社会反推它的历史根源，不等于就可以将历史的发展线索顺延到当下，给出当下人们会普遍同意的社会连贯性解释。因此，赵鼎新的儒法国家命名下的中国历史解释，作为一部历史社会学著作，需要的不仅是历史学的传统知识检验，还需要社会学的传统知识检验，与历史社会学的新知逻辑的检验。他要么以“讨好”三家而获得普遍喝彩，要么以“得罪”三家而不获接受。就第一个方面来看，赵鼎新的解释要让中国历史学界接受的难度甚大；就第二个方面来看，赵鼎新不得不借助既成的社会学知识作为自己的知识奥援，其中尤以对迈克尔·曼以四大权力形态解释社会变迁的直接援用，就可能被责备为知识懒惰的表现以及知识创新的不足；就第三方面来看，因为历史社会学试图解释现代社会的历史源流，这个问题之阔大不经，任何结论都会有其理据，但任何结论也都会因为支持理由繁杂而让人摸不着边际。这给人一种面对历史社会学的模糊认受。

第二，历史社会学也好、历史政治学也罢，其理论意欲都是想排除宏大社会理论建构，转向历史，而将历史当成寻找当下社会机制在历史中位置的知识进路。这就是赵鼎新所明确指出的：“历史社会学是基于特殊视角和方法而形成的交叉学科，但它的核心议题却很清晰，甚至可以说只有一个，那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①这是一个他自陈、也公认的韦伯命题，也是一个历史社会学试图扎根其中的母题。但循历史社会学做出的相关解释，则是一种知识僭越。因为解释这样的问题，是一般知识建构很难完成的任务。它只能在实践的脉络去寻求解释理由。如果尝试将实践性极强、现实性鲜明的社会机制归为一个理论解释活动，那就只能将历史固化为一个时刻的定势，而无法反映历史变迁的灵动性与人类活动方式的重构性。在历史社会学与历史政治学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在研究预设上存在为革命辩白的意识，旨在反拨或矫正曾经流行的“革命耽误现代”的断言，认为革命其实是另类的现代努力方式。这自然是一种可以鼓励的知识探究路径。但一般地讲，另类的努力肯定不是它所尝试矫正的那种努力的同一种努力，因为它的辩解方向性已经改变。无疑，在建立现代国家时，政治现代化是最重要的一个构成面。一旦未能规范国家权力，那么建构现代国家就仍然在路上。这是一种比较尴尬的处境。从结果上很难将这样的国家称为现代国家。但因为这样的国家在历史上做出过多种多样的现代建国尝试，因此就可以在历史社会学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给予辩护。在此意义上，可以被纳入历史社会学范围的新革命史、中国古

^① 赵鼎新：《什么是历史社会学？》，载《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代国家研究、中国现代革命的正当性辩护，都因其运用了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的方法，而具有知识上的探究理由。但如果就此消解中国现代建国问题、消解中国深水区改革问题，尤其是遮蔽艰难的限权机制的建构问题，其研究的合理性程度就势必降低，研究的有效性就必然下降。这在历史社会学的创制者韦伯那里已经遭遇到相关的尴尬：尽管韦伯做出了迄今为止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①这一论题最宏大、最令人震撼的解释，但因为它是一个残缺的解释，即他的相关解释是未能完成预期研究设计的解释，因此在没能说明主要宗教如西方的天主教、东正教，以及伊斯兰教等宗教伦理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所发挥的作用，因此不能构成对资本主义何以仅仅兴起于西方的完整且可信的解释。相应的问题就是，他对儒教等宗教伦理不利于助长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产生的解释，是一个固定时空条件下的静态解释，一旦解释项发生变化，其解释就不能成立了。如因为当代所谓“儒教资本主义”的兴起，他对于儒教、道教与资本主义兴起关系的论述就需要改写。而历史政治学这类尚未确立自己学科母题、以及相应孕生出有关子课题的论题，它是否能构成一个学科，需要接受严峻的质疑。

第三，是相关学者尝试免除社会理论失落之后，社会学研究日益碎片化、历史学日益倾向琐碎叙事、政治学研究日益技术化的窘迫。就历史学讲，在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叙事传统很难延续的情况下，历史学研究的规范进路需要解决如何实现自我拯救的问题。以此避免历史学陷入历史叙事的无限繁杂，让历史叙述丧失目的性引导，以至于让人们不知道如何面对历史，不清楚在历史中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启示。历史叙事越生动，我们在历史当中获得启发就越困难，人们久而久之就会疏远历史学的史实叙述。因此，历史学不得不在跨学科中左冲右突。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兴起，也多少与之相关。但对历史的细致描写、跨学科的交叠陈述，能不能帮助历史学走出困境，还是一个疑问。就政治学而言，田野研究能不能直接上升为国家理论，公共管理化的政治学研究能不能提供有效的政治解释，社会学化的政治学能不能指向权威—服从关系的法治化建构，都是在未定之天的疑难问题。这是不是可以兼得两个学科边际建构的优势，从而为感兴趣的人们展现新的知识蓝图呢？那还得经由尝试这类研究的学者，取得更具公信力的研究成果之后才能得出结论。可见，汲汲于历史社会学的成功，就仿照“历史+”的方式来亟于建立相类学科，恐怕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跨学科的研究，需要明确自己的知识扎根之地，否则就会流于一些漂浮不定的宏论。

三、意图与结果的错位

理性地看，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等诸如此类的学科，其规范理论研究兴趣和宏大理论建构能力，与其理论探究的主观意图之间存在明显错位。相关的跨学科探究常常变成琐碎问题的细微追究，宏大主题的难于处理变成研究者有所回避的论题。人们会发现，无论是社会学、还是历史学、政治学，本来各自就已经发展到复杂得试图尝试包办一切问题的解释，以至于它们都带有明显的“学科帝国主义”色彩。相比而言，如果说社会学的历史较为短暂的话，历史学与政治学都是历史极为悠久的学科。这些历史悠久的学科，已经形成了一些刚性的学术母题与研究规范：如历史学以社会变迁凸显历史进步，政治学以政体研究探究政治生活方式。即便是历史较短、不出百余年的社会学，也形成了探究现代社会机制的学科母题。人们完全可以根据一个研究者择定的主题与选择的研究进路，判断其研究属于哪一个学科范围的研究。发展也相当晚近的经济学，更是以人类的谋利方式为母题，展开了全方位的经济活动分析，肆意侵入各个学科的“领地”之中。人类社会诸多问题的探究，可以说大致逃不出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圈套。但正因为如此，它们各自

^① 赵鼎新：《什么是历史社会学？》，载《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的学科畛域，也让学科探究走向了一个自我封闭的状态，以至于需要相互借取知识资源，以便闯出一个学科新天地。

历史社会学尝试证明，该学科有实质性的研究问题，有宏大的理论结构支持，它将不仅能够拯救人文学科（传统历史学），还能够拯救社会科学（传统社会学）。犹如赵鼎新明确指出的那样，历史社会学将曾经是明确偏向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与曾经是明显偏向历史学的事件/时间序列叙事结合起来，因此生成了一个传统社会学与历史学都不曾具有的学术新视野。这是因为，历史社会学发现了两者的相生相随特性，“当我们强调时间/历史的规律性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强调了某些社会结构和相应机制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完全坚信某种线性史观，我们其实也完全认可了某种社会结构决定论。反之，当我们越不相信时间/历史有规律，我们同时也轻视了社会结构/机制的重要性，强调了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能很好掌握和设计自己的未来；如果我们完全认可当今世界上盛行的观点，比如西方历史学家强调的‘每个历史都是自己的历史’，或者一味强调‘转折点’、‘分水岭’和‘关键事件’对于时间/历史发展重要性的话，那么不但结构/机制分析完全失去了意义，而且会使以结构/机制分析见长的社会学和以事件/时间序列分析见长的历史学走向学术意义的同归于尽”^①。这种将历史学与社会学视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关联学科，成为历史社会学足以成立的辩护理由。

因此，如果信从这样的证词，那么就会相信，只要社会科学转向历史，面对的将是一片光明前景。于是，社会学转向历史，广而言之，社会科学转向历史，变成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交叉学科，就是一个学科发展的趋势，而不是一群学人的个人研究志趣。但这些学科的成就，还需要接受人们的广泛质疑：它们会不会变成“某某学科一个筐，乱七八糟往里装”呢？在知识探究的无政府主义方法主张中，往这一个个知识的大筐子随便装什么东西，倒也无妨。但这似乎并不能成功解救综合之前的各个学科的生存危机。这就是在当下知识琐碎化的处境中，人们自觉回溯知识发展的宏大理论传统，呼吁宏大理论回归的原因。当然也得承认，从20世纪70、80年代到现在，人们对宏大理论的召唤，成功度并不高。不但宏大理论难以回归，人文社会科学的琐碎化程度，似乎仍然在无可挽救的增强。这非常可悲。在“现代”走向“后现代”的趋势中，解构、去中心，接连宣布“上帝死了”“人死了”，最终导致宏大理论的重建缺乏有效呼应的悲剧性结局。

可以说，由于不是统一的知识努力，历史社会学或其他相类学科，难以兼得历史学和社会学、或者其他双学科或多学科的优势，或兼得双方对接的那些学科的各自优势。但这不能断言诸如历史社会学、历史政治学这样的学科尝试就没有意义。如何兼得传统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优势，确实是走出分裂的人文社会科学窘态的必须之举。就此而言，历史社会学堪为两个或以上的传统学科进行综合研究的典范。何以如此呢？原因很简单，这是两个帝国主义式的学科走向新综合的宝贵尝试。就现代学术知识体系来讲，历史学构成人文学知识体系的帝国主义范式。这是指，不管你从事的是人文学科的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无任你研究任何问题，都逃不过“历史”的圈套。任何分门别类的子学科都存在历史学子学科，以至于马克思、恩格斯两位规范理论研究颇具天分的人物，也不得不说研究哲学就是研究哲学史，因为他们也无力挣脱历史的有限。任何与时间叙事相关的具体历史故事，都是一个如来佛的手掌；无任你是哪个学科“孙行者”式的研究者，你都无法逃脱它的限制。于是，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大致会进入历史学那种“两史一论”的框框，即历史科学理论加上世界史与国别史。这种具体学科分类法很难有强大的支持理由，因为这样很可能导致研究者深沉的历史思索被切割成细碎的历史叙事。因此，历史的理论叙述，会成为理论的概括表达或

^① 赵鼎新：《权力、结构和时间性——历史社会学和宏观历史发展规律》，载赵鼎新主编：《历史与变革·第一辑·什么是历史社会学》，10-11页，中信出版集团，2023。

零散知识的堆砌；而历史的叙事，变成了缺少价值引导和宏观理念统摄的深挖细节。这是一种历史学的困境。但在双学科或多学科的相互支持研究中，历史学的困境出现之时，社会学可以出来拯救历史学。反之亦然。社会学也是颇具帝国主义色彩的学科体系。几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都有社会学的子学科，人们几乎无法逃出社会学的研究“套路”。但凡有新的问题域出现，社会学就会跟随而至，发展出一个新的子学科。这简直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学科罗网。假如这种相互支撑的学科结构，在任一方缺乏自我支撑力量的时候，互补的另一个学科便提供足以弥补其缺陷的资源。由此，一种“抱团取暖”的学术效应就会浮现出来。

如前所述，赵鼎新在阐述历史社会学的学科特性时就明确指出，历史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子学科，而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综合性学科。他这是抓住了历史社会学的学术真正优势所在。他还指出，历史社会学的构成性母题，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这构成判断人们是不是从事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的学术理由。这个也就将历史社会学的学术边界给勾画出来了：研究这个问题的就属于历史社会学，不研究这个问题的就不属于历史社会学。就此而言，历史社会学的学科结构，表现出一种历史学问题以社会学面目展现，社会学探究无限地打开了历史的复杂性闸门的独有特点。历史叙事的无限可能与社会建构的无限深度，双方互相显示魅力，实现对对方的学术“拯救”。结果当然就是，双方优势成功兼得，构成一个让历史学和社会学都走出困境的、极为光明的知识景象。

社会学长期以宏大叙事来展现自己的学科魅力。今日社会学，可以说与经济学一样，成为具有帝国主义特色的超级学科集群。赵鼎新所罗列的各种社会学子学科，如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法律社会学、体育社会学、军事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社会人口学、性别社会学等等，就可以佐证这一点。这与历史学已经出现了凡有学科就有该学科历史的子学科，凡属不同社会领域也有相应历史呈现的状态完全一致。这种高度发展的学科帝国主义，还想跨出学科畛域，兼得两个学科帝国主义的优势，其学术豪情可以想见，那会形成一个帝国主义学科自我放弃帝国营构、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学科致意的匪夷所思景象。其结果，不是两个帝国主义气质的学科的互相解构，而是生成了一个具有超级帝国主义气质的新学科。这是一个诱人的前景：历史学的琐碎克制住了，社会学的支离也消失无踪。随之浮现出来的，将是对人类现代变迁颇具恢弘气势的宏大阐释。但历史社会学或历史政治学的学科兼得性优势是很容易成就的吗？肯定不是。因为双方知识的建构都有各自的规范、原理与定势，作为现代专门知识，跨出学科的界域，都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未能兼得优势不说，反而丧失原有学科优势。这是一个必须率先兜底的事情，然后才可能在学会一个学科爬行的本事之后，去学科间的广阔天地里翱翔。

可见，尝试兼得两个或以上学科优势的跨学科研究尝试，存在一种知识风险，即两个学科的各自优势都可能无法保有。历史学不够“历史”，社会学不够“社会”，政治学不够“政治”。仅就历史学而言，可能会面临三个指责：一是史料不足。历史学无限地占有史料非常困难，历史学在不断发现新史料，但社会学急于把历史叙事拿来建构社会理论。二是历史学难以清晰刻画历史细节，历史社会学则明确建立有目的性的社会趋势论，结果伤害了历史真实的再现。三是想以历史目的性整合历史叙事的时候，让社会学无法真实叙述“社会”。这就让历史社会学不仅难以引入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而且让其难以在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叠向度，呈现整个“现代”的总体图景。

对历史社会学而言，是去尝试建构兼得历史学与社会学优势的新学科重要呢？还是回到社会理论传统更重要呢？这也许并不是一种互斥的关系。但将之置于一个互斥的关系中来考察，也许是无意义的事情。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理论有很大区别。前者重在探究社会构成机制与凸显社会问题及其机理，后者重在提供一个规范现代社会的理论建构图景。前者的叙事性较强，与历史学对接的空

间较大；后者的规范性较强，叙事性较弱，很难与历史学进行学科对接。要试图找到两者的对接口，就需要创新研究大思路。历史社会学会不会只是社会理论的一种形态而已呢？如此的话，它就很难挣脱社会理论的传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就只是一种进行社会理论阐释的方法或途径。“社会理论起源于现代早期，可以把它看成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从16世纪到20世纪，现代性的主题一直是社会理论当中一项起到统合作用的重大主题。为许多不同的研究途径提供了参照框架，这些途径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力求提供一种关于现代世界的解释。因此，社会理论首先是针对确定现代性形貌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的兴起所做出的一种反应。”^①既然社会理论研究已经将各种学科资源整合起来去集中探究现代性的兴起，那么只是尝试从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视角去解释社会变迁的历史社会学，似乎很难逃出社会理论的研究传统。历史社会学的命名，可能不过是试图免于琐杂的社会学问题研究，重启社会理论研究的一个理论尝试罢了？！

四、结论

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刻理解，促使我们到历史纵深处去寻找知识与智慧。历史确实从源头上给我们提供爱和智慧的双重资源。从古至今，历史促使我们思考的都是行为取向而非知识建构。而一切从史实出发的思考之所以能够促使思考，一直都在各种学科的边际之间展开。这无疑给予历史社会学等交叉学科以强大的支持理由。这中间存在一个休谟模式与超休谟模式的选择问题。休谟模式，即事实—价值（value vs. fact）模式。由于美国分析哲学家普特南揭示了，从来都不存在没有事实根据的价值立场，也不存在没有价值立场的事实陈述，因此价值与事实的缠结，宣告了价值与事实二分法的崩溃。一种基于规范和操作（normative vs. operation）的二分模式尝试取而代之。尽管休谟二分模式在社会科学哲学上依然具有无可争议的支配性地位，但普特南对之的质疑，已经为人们展开新的尝试提供了指引。在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社会学就需要慎思基本的规范意识，应对操作化社会的行为需要。因此，一方面必须肯定，历史社会学试图兼顾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优势，非常可贵，因此值得继续尝试；另一方面，一种双赢的学科建构与双输的巨大风险，需要相关的学科尝试保持清醒的认识。与其一心获得跨学科优势，不如回到现代基本规范。也就是说，赵鼎新对历史社会学的问题圈定，比对历史社会学的匆忙理论突围更为重要。也许，历史社会学及类似的学科研究价值，就会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或者，历史社会学的兼得两个学科优势的寓意，就有落在研究实践中的机会？！疑问与感叹同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学科趋势，对历史社会学的未来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这一趋势就是历史社会学的边际界限愈来愈模糊，以至于它的命名会不会丧失正当性，也让人疑虑。历史社会学在发展中形成这一趋势，自然与其综合学科优势的企图紧密相关。当越来越多的学科被纳入历史社会学研究范围时，一方面固然让历史社会学获得了更多学科的学术资源，但另一方面也让历史社会学的边际关系面目全非，其命名是不是成立可能都会成问题了。“历史社会学进入了一个后学科阶段，既不完全由历史学统治，也不完全由社会学统治，而是受到了这两个学科的双重影响，其背景是一个更加广阔、更加具有多学科色彩的领域，社会学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就方法而言，出现了一个从解释到阐释的转向，多元视角得到采纳和鼓励。确切地说，我们认为历史社会学进入了后学科阶段，是因为它现在提供了一系列灵敏度，后者可见于遍布各学科的各种历史学和社会学实践。它还更强烈地意识到了一元方法的衰亡，特别是关于历史解释之本质的意愿方法的衰亡。”^②换言之，历史社会学因其意欲兼得双学科优势的学科动力，非常讽刺地因为跨过越来越多的学科，而变得愈

^① 布赖恩·特纳编：《社会理论指南》（2版），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② 杰拉德·德兰迪等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来愈没有优势，甚至是成为它继续发展的劣势，乃至构成其学科解体的直接原因。这从近期迈克尔·曼对民主政体的研究、斯考切波对革命的研究，以及休厄尔对社会史、文化史的社会理论重构，都可以窥见这样的趋势。难道历史社会学的繁荣同时就意味着历史社会学的衰颓?! 是否真是如此，端赖历史社会学如何进一步展开自己的研究向度。

Historical Sociology: How to Combine the Advantages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REN Jiantao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Historical sociology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that integrates history and sociology.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onstructing such a discipline,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discipline attributes, knowledge interests,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n terms of disciplinary attributes, it is not a subdiscipline of history or sociology, but a comprehensive subject which combines two disciplinary traditions. In terms of knowledge interest, it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knowledge advantages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and it encourages people to focus on its knowledge focal points, namely the construction issues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and nation—states. In terms of practical orientation, it needs to clarify its goal of promoting modern and sound development. Similarly, disciplines such a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etc. also require corresponding attempts to sufficiently justify the existence of the discipline. Thes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ttempts must avoid the tendency of trivialization within the discipline and emphasize the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resources across disciplines. In terms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it is important to pay high attention to the normative tradition of social theory and to construct a normative theory of the discipline, so that it can practically present its theoretical attempt to combine the disciplinary advantages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Key words: Historical Sociology; Discipline Attributes; Knowledge Interests; Practical Orientation; Combined Advantages